

潮州歌册的音乐学研究文献综述

◎ 黄心月

(哈尔滨音乐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28)

[摘要]潮州歌册的音乐学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它萌芽于20世纪40至80年代,采风和艺人的经验总结是此期间宝贵的研究材料。研究正式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前辈文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在2008年以后,研究才蓬勃发展起来,主要包括理论研究、田野调查、音像数据库建设,但其深度广度仍有不足。就现有对潮州歌册的音乐学研究而言,只有女性音乐研究视角的研究发展较为成熟。对潮州歌册的音乐学研究急需开拓视野,城市音乐学、音乐史学、音乐变迁、影像民族志等都是值得深入挖掘的领域。

[关键词]潮州歌册;音乐学;音乐人类学;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40/j.cnki.hhzs.2025.18.014

潮州歌册是粤东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说唱艺术,兼具文学和音乐双重性质。潮州歌册的创作者是文人,只谱词不作曲;演唱者是业余的妇女群众,她们依照既定格律的歌词即兴创编旋律,在私人场合传唱。基于此,潮州歌册的文学研究根基深厚,涉及面广;而音乐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文章将从音乐学立场出发,对潮州歌册的研究进行重新梳理,以作为后续潮州歌册音乐研究的基础。

一、潮州歌册研究综述

对潮州歌册研究的文献综述最早见于郭马风在《潮学》期刊上的《潮州歌册志(连载)》系列文章。其后,肖少宋在其200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以及同时期邹珣的《旧版潮州歌册研究述略》都有相当精彩的梳理。两人在时期划分上不约而同,后者将潮州歌册研究划分为“萌芽”(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普及”(20世纪80年代)、“新变”(20世纪90年代至今)三个时期,前者虽无明言划分,但能够与后者吻合,认为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高起点但后期低迷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一个以专题研究为突出特征的逐步兴盛的时期。

据此分期,以下对潮州歌册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概述。

最早的研究普遍追溯到萧遥天在抗战后编写的《潮州戏剧音乐志》中的“唱歌册”和“潮音戏寻源”两个条目。

20世纪60年代初,郭马风写了《旧潮州歌册版本调查杂记》和《潮州歌册的艺术特色》,1963年唱潮州歌的能手和作者萧菲做过《我写歌册的体会》的演讲^[1],但由于经历“文革”浩劫,这时期的研究成果没能保存下来。

改革开放后,对潮州歌册的研究兴趣和一些原来停滞的工作逐渐恢复。上海学者谭正璧于1982年出版了《木鱼歌·潮州歌叙录》;郭马风于1982年重新书写了《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陈冕、郭华于1983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撰写了《潮州歌》条目;另有薛汕于1985年出版的《书曲散记》;林有铤于1992年出版的《潮州民间文献浅论》;陈香白于1993年出版的《潮州文化述论选》等著作中包含了潮州歌册相关章节。

从这一时期的成果可以看出潮州歌册的传统研究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除了旧有领域继续发展,还出现了吴奎信里程碑式的专著《潮州歌册》。另一方面,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拓展,邹珣称之为“新领域”,而肖少宋则称其为“专题研究”。这体现为具体视角的代入、单本歌册(个案)研究,以及海外学者的加入等。例如,陈春声的《〈游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会——兼论潮州歌册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以文化学、社会学视角,对歌册《游火帝歌》进行了研究;日本学者上田望和大冢秀高于1999年合作编写的《潮州歌册研究目录(稿)》是有关潮州歌册研究的重要文献检索资料,台湾的王顺隆发表了影响重大的《“潮州歌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

作者简介:黄心月(2003—),女,哈尔滨音乐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2008年,潮州歌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其影响在往后的十几年中愈发显现。经过文献分析和归纳,笔者认为,非遗语境直接催生了四类研究,分别是田野调查、数据库建设、非遗传承理论及非遗传承实践。

首先是田野调查。十几年来,许多潮汕当地和广州市的高校师生以及专门研究者都对潮州歌册进行过规模不一的田野调查,其中最重量级的成果当属刘文菊等人于2017年出版的《潮汕女性口述历史:潮州歌册》。

其次是数据库建设方面的研究。为促进非遗保护和传承,潮汕地区的汕头大学、韩山师范学院,以及专业音乐院校星海音乐学院,都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潮州歌册数据库。例如,郑喜胜合著的两篇文章即基于韩山师范学院潮州歌册数据库的实践。

第三,关于潮州歌册的传承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各抒己见的文章,其中以韩山师范学院林朝虹和林伦伦两位教授的《潮汕民间文学多模态传承体系的构建及其传播路径》见解最为深刻,与潮州歌册的传承保护实践高度契合,具有较高的理论指导价值。

最后,随着社会对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视,潮州歌册进校园/社区、讲座、公益培训等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非遗实践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文章,但目前未见学术性的探讨。

二、潮州歌册研究的主要语境和方向

上一部分中,以年代为划分依据的方法固然实用,但却不能说明潮州歌册研究态势变化的原因。而对各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语境的探讨能够比较好地弥补这个缺憾,并帮助我们梳理出该领域历史发展的脉络。这里的“研究语境”,指的是研究者开展调查和书写实践时的时代、社会的大语境,判断的依据首先是作者主观的研究目的,其次才是客观的研究内容。

第一个主要的研究语境是方志书写。其源于先秦时期,到了近现代依然持续受到重视,在近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潮州歌册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萧遥天的研究与20世纪40年代的《潮州志》编写密切相关,而郭马风、郭华等人的研究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物普查和新方志编写工作引发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热潮中的一部分。

第二个主要的研究语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实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潮州歌册的创作从无意识转向有意识,政治宣传和教化功能得到极大发挥。创作实践

的变化影响到潮州歌册的研究语境,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才显著体现出来。这一语境下,潮州歌册的研究是服务于创作和表演实践的理论夯实和经验总结。

第三个语境是“文革”。“文革”的影响表现为潮州歌册表演实践历史发展的断裂和研究的倒退。这直接导致了第四个语境:“文革”结束后的恢复语境,即研究者们逐渐重拾、恢复研究的兴趣和实践。

在从改革开放到入选非遗这一时期,恢复语境可以对应应该时期潮州歌册的“传统”研究领域,与时期重叠并略微滞后的另一种主要研究语境——改革开放影响下的学科建设突飞猛进的语境相区分。伴随着新视角、新方法的引入,以及新一代学者的涌现,大批为学术目的而进行的研究开花结果。

最后,2008年以后,非遗语境日益体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实践有类似之处,后者语境下的研究大都服务于创作和表演实践,而前者则服务于非遗传承保护的实践。

这六个语境并非截然分离,反而时常相互重叠: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的语境的更迭需要过程,前后语境之间并非都是替代的关系,可以并存,可以承继,例如恢复时期的研究同时承继了方志书写和新中国文艺两种语境下的研究。在隐喻的空间(学术领域)上,学者们并不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某个语境之中,甚至可能主动追求在跨学科、交叉语境中进行研究。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潮州歌册的主要研究方向按照研究语境大致可划分为六类,其历史发展脉络总结如下页图1。

以下对脉络图做四点补充说明:

1. “①风俗、音乐志”对潮州歌册的书写是所有潮州歌册研究的开端。方志书写的语境古来有之,但具体到潮州歌册研究,这一语境始于1940年代。

2. 前后两类“②服务于文艺实践的研究”的语境:新中国文艺语境和非遗语境,都直接产生于政府的方针政策,而非学术界内部濡化而成,两者间也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③、④、⑤、⑥四者则不然,它们的语境是由相关研究建立起来的,语境的产生滞后于研究。例如,“③文学历史学方向的研究”大多脱胎于文人笔记和方志,“④音乐学方向的研究”建立在采风工作的基础上,两者又都受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潮州歌册的创作和表演实践的影响。简单说,在这两个例子中,同样的研究者,从有到无、由弱到强地建立起学科的意识,从而导致了研究语境的改变。“⑤女性主义方向研究”是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潮在潮州歌册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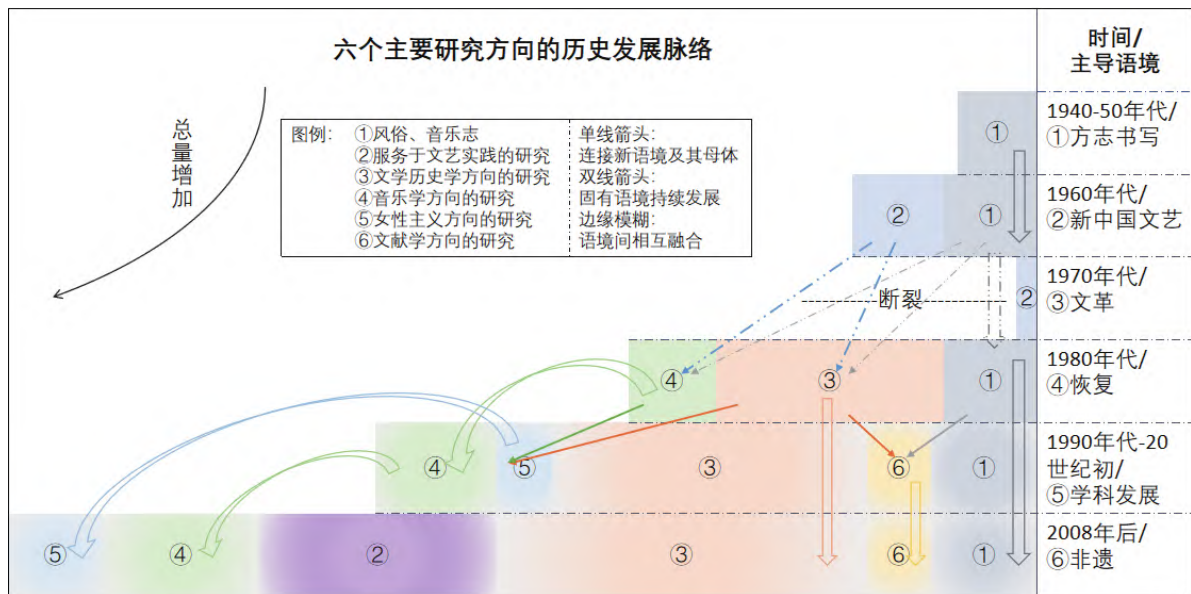


图1 六个主要研究方向的历史发展脉络

究领域的一种体现。“⑥文学方向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对潮州歌册藏本的编目工作，但相关研究的问世却要等到21世纪初，新兴的现代文学学科将目光投向了潮州歌册，就像打开了尘封多年的宝库，迅速在潮州歌册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3. 潮州歌册文学方向的研究发轫早，积淀深，内容丰富，在潮州歌册研究中稳固地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其内部已经做出次一级的学科划分，但未在图中体现。

4. 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趋势，例如研究方向的细化，又如学科边界逐渐模糊，领域交叉和融合的情况日益凸显，跨领域成为学者们主动的追求。研究语境的边界也在模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潮汕女性口述历史：潮州歌册》，既强调女性主义，又有民俗、历史学属性，还不能离开非遗的语境。在当下，一位学者的研究往往建立于多个语境的重合之处，不同在于，目的明确者主次分明，意志不坚者则迷失方向。

三、音乐学方向的潮州歌册研究

从潮汕地区传统音乐的研究来看，潮州歌册的音乐学研究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一方面，笔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有记录的潮汕地区文艺活动中，都未见到潮州歌册节目，而潮剧在传统文艺中非常活跃；另一方面，虽然潮州歌册在非遗名录中被归类为“曲艺”，但对比潮汕地区其他的非遗音乐体裁，潮州歌册的记谱材料少且时期晚。在

这一背景下，笔者将对现有的潮州歌册研究与音乐学相关的成果进行文献综述。

(一) 现有文献综述

在潮州歌册研究中，文学和音乐学的发展轨迹并不一致。从研究者来看，早期的萧遥天、谭正璧、薛汕、郭马风等研究者，基本都被认为是俗文学家，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专业音乐学者投身潮州歌册的研究。

音乐学方向的潮州歌册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确立期（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和发展期（2008年以后）。下面结合语境进行阐述。

在音乐学研究的语境出现之前，有两种研究性质的活动与之紧密相关，即田野采风和艺人的经验总结。田野采风活动并非一定带有研究目的，但偶有对潮州歌册的音乐形式、表演形式留下了记录，就为后来者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例如1962年开始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编辑工作。后者的典型代表是萧菲，目前仍可见“文革”后期由她演唱，陈源河记谱、整理的《潮州歌册的十种唱法》。

改革开放后，在恢复语境下，“文革”时期中断的文艺集成工作得到恢复，文物普查和新方志编写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曲艺志·广东卷》和与之相关的《中国曲艺集成·广东卷》先后开始筹备和编纂，均于21世纪初完成。此外，为了协助辞书出版，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写了《广东省戏曲和曲艺》资料册，可惜的是潮州歌册部分的谱例因篇幅原因被省略。

在略滞后于恢复语境的学科建设语境下,星海音乐学院教师吴丽玲的《论潮州歌册的历史渊源与现状》是目前可见最早的音乐学学者对潮州歌册进行的研究,包含了八句潮州歌册的记谱。该研究体现出文学学者的早期研究为音乐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许多共同的论题,例如起源、题材体裁、创作者(作词者)、出版者、传唱者等,音乐学学者直接引用了文学领域前辈们的研究成果。

随着新思想、新理论的传入,学科边界不断扩展与模糊,潮州歌册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例如,袁尔纯《潮州歌册的社会教育学阐释》从社会教育学角度对潮州歌册的教育学蕴涵和意义展开了讨论,但较为浅显。

又如陆小玲的系列研究。陆小玲的研究方向是音乐人类学,这一学科具有很强的跨学科属性。女性主义视角在潮州歌册研究中向来受到关注,目前可见最早的专门讨论是陈觅、郭华于1990年出版的《潮汕妇女与潮州歌册》,而中国知网上能找到最早的就是陆小玲于2010年发表的《潮州歌册传承中的女性意识》。这篇论文主要建立在非遗语境之上,把非遗传承人林阿姆的口述史料与不同时期潮州歌册的文本分析相结合,偏向于认为“社会文化的变迁导致‘个体的集合逐渐被融入到一个不断发展的格局和线路中’,以致女性的群体意识发生了改变”。2011年,陆小玲发表了第二篇更为激进的论文《文本的价值观与行为的模式化——潮州歌册的女德教育功能对生活中女性“性别角色”的影响》,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结合田野调查材料,探讨了社会文化如何通过歌册这一文本形式对女性产生影响及其表现。同年,作者还发表了《潮汕民间音乐文化现状及其所承载的社区精神》,潮州歌册是其研究对象之一,作者将其视为社会变迁导致音乐变更的典型个案。该文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此外,关于音乐学的跨学科研究还有廖文兰、程海青的《潮州歌册传承与潮汕妇女精神塑造的传播心理研究》,运用了传播学方法。

总体而言,潮州歌册的研究传统长期将其视为文学体裁,而未对其音乐体裁属性给予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8年入选非遗,潮州歌册被定性为“民间说唱形式”,此后才有较多专业音乐学者投入潮州歌册研究之中。但即便如此,深入而有见地的音乐学研究依然欠缺,这一领域仍待耕耘。

(二) 欠缺之处和未来研究方向

在上文中,笔者已系统总结了潮州歌册的研究态势、主要语境和方向,划分了潮州歌册音乐学研究的三个阶段,

并进行了音乐学成果的文献综述。但另一方面,一些应有但未涉及的内容也需要得到我们的关注,进行反思并作为对未来研究方向的指导。最后,以下是笔者的一些见解:

1. 目前未见对潮州歌册展开研究的音乐学硕博论文,而文学方向至少已有六篇硕士论文、一篇博士论文。其中郑将来的硕士论文《福建东山歌册调查研究》调查了与潮州歌册有亲缘关系的非遗音乐东山歌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虽然当前将潮州歌册引入学校教育的实践已经不少,但直接相关的文章却不多见。事实上,潮州歌册进校园的实践异常丰富,从幼儿园、小学到大专、大学,甚至老年大学,覆盖面非常广泛,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入点。

3. 在笔者所见的潮州歌册音乐学方向的研究中,几乎所有人都将潮州歌册描述为一种“独唱无伴奏和表演的形式”“是劳动妇女的自娱性活动”,这的确是对它在近代形成的较为成熟形式的精练概括。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潮州歌册前沿的实践已经做出了将潮州歌册舞台化、媒介化、现代化的尝试,这些尝试由于实践积累不足,因而未能构建起自己的理论,如今也极少得到学界的关注。

4. 依照民族音乐学领域杨民康教授的文化衍生层次理论,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潮州歌册研究发展四阶段的前两个时期内,潮汕歌册文化属于原生层和次生层,而后两个阶段处于再生层。从这个角度出发,后继的研究应该考虑到全球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等后现代潮流在国内的具体表现对潮汕歌册变迁的影响。

5. 可能由于演唱者的业余性,对潮州歌册旋律的记谱和音乐形态分析严重缺乏,而口述史和文化阐释的成果则比较丰富。

6. 从历史音乐学的角度来看,尚无成果对潮州歌册的音乐发展史进行过梳理,涉及音乐发展史的研究大多指涉上述第二、三阶段。不仅古代、近代专题史缺位,对当下非遗性质的潮州歌册的研究也很零散。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大多把目光投向“断裂”之前潮州歌册的典型形态,寻找其“边缘留存”,另一些研究者对非遗传承人进行访谈,但未见对当下作为非遗的潮州歌册的创新实践进行探讨的文章。◎

参考文献

- [1] 郭马风.潮州歌册志(连载)[J].潮学,1997(8):14-18.